

尚永亮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贬谪文化 与贬谪文学

——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
及其创作为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尚永亮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8

(两岸文化星系丛书/董乃斌, 龚鹏程主编)

ISBN 7-311-02225-8

I. 贬... II. 尚...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083 号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

——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

尚永亮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25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6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7-311-02225-8 定价: 25.50 元

《两岸文化星系》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董乃斌 龚鹏程

执行主编

李纪祥 刘志伟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盾	王成勉	王兆鹏	刘志伟
刘跃进	陈 飞	尚永亮	李 浩
李纪祥	李朝东	张 兵	汪涌豪
张伯伟	张克非	张宏发	吴承学
陈晓龙	赵孝萱	高柏园	龚鹏程
董乃斌	傅 刚	蒋秋华	雷紫翰
翟本瑞	颜崑阳		

序

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海峡两岸的分隔睽离已逾半个世纪,但人民之间的往来和学术文化的交流,却因为中华文化的根系缠结、血脉相连而始终并未完全断绝。近年来,两岸的学术交往更是相当频繁。这里,既有学者间的互访切磋、合作研究和资料的共享,也有相互邀请客座讲学,或共同筹组举办学术会议等等;至于学者们各类著作在两地交互出版,或同时出版,也早已司空见惯。两岸学者的知识背景、学术趣尚乃至运作的路径、方法、习惯,都各有特色,如此交流,适足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些年来,两岸学术文化均颇有提升与进展,此种来往交流的推动促进作用不可低估。当然,目前还有种种的不方便不通畅不自由,还远远未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所以,两岸有识之士都在做着进一步的努力——感人的愚公移山式的努力。

“两岸文化星系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丛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共有的中华文化,具体范围则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与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关系,题目有大有小,可古可今,涉及面宽广,观念视角各异,方法手段不同,每本书都是一家之言,都力求有所创新,而归根到底则是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剖析、估量和论证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既阐扬它的历史价值,也试图探寻它更新和发展的途径,而我们深心的抱负则是要使中华文明在全球化的汹涌波涛中稳立潮头,并且能够乘长风破万里浪。21世纪,中国

人、中华文化,理应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

丛书的计划则是从小做起,一辑一辑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出下去。我们的每一本每一辑或许只配算是一砖一石,但积累起来,却也能铺一段路。我们愿踏踏实实地为两岸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发扬,为中华民族乃至为世界的今天与未来,做一点事,愿以我们每一部呕心沥血的著述,充当前进之路的铺路石。“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先人的教诲永远策励着我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还很具体地体现了祖国西部与台湾的合作。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使之赶上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是中国致富致强的战略关键,也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而目前,调动全中国全民族的力量投向大西北的态势已然形成,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好的机遇。由台湾和大陆两地学人合作编辑这套丛书,并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也算是我们为这个伟大事业所奉献的一点微力吧。

衷心祝愿“两岸文化星系丛书”顺利诞生,茁壮成长。

是为序。

董乃斌

2003年7月10日于沪上

序

中国历史上共有八个分裂或分立的时代：春秋战国、楚汉之争、三国、南北朝、隋唐之际、五代十国、宋金对峙，以及现在两岸分隔的局面。

每个分裂或分立的时代，都是历史论述的焦点，原因有三：

（一）政权由统一趋向分裂分立，再由分裂分立走向统一，其历程起伏动荡，最具有历史的动态发展意味，足以观古今之变，了解国家分合与兴衰之故。

（二）分立的时代，自然会形成政策、人才、资源、文化、社会、方略等各方面的对比性，形势既足资比较研究，自然吸引人关注。

（三）除了历程充满动态，内部又饱含对比之张力以外，分裂的时代亦必充满了各类冲突，包括军事与非军事之冲突，引生出许多故事，远非承平时期之平凡枯淡可比。我们看古代许多讲史小说都喜欢拿这些时代来评说渲染，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这么说，不免有些“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意味了。凡分裂分立之时代，其实都是不幸的。政权之争，往往形成军事与非军事的对抗、人民流离、骨肉失散，文化也常遭到撕扯。故其引人注目，令人为之讲说评议不断者，正因其易使人为之唏嘘浩叹也。

然唏嘘浩叹，愁苦之言易工，四海涂炭，也许反而成就了几卷好诗。而对峙与分立，事实上也让社会文化有了分别发展的机会，形成

不同的风景，足资观玩，此所以不幸之年代反而可能在文化上大放异彩，像春秋战国就是如此。

两岸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隔海分治已五十余年。岁月如流，人情未改，其间虽屡经波折，但终究断不了文化的根脉，两岸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与发扬也各擅胜场，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分隔反而形成了对比的张力，让文化的不同质素或面相，分别获得机缘，得以恣情展现。

但是，分隔的形势，毕竟又让这种不同难以交流，使得各自发展者无从因对照互补而交光互摄，创造成一个更光辉灿烂的时代，这难道不遗憾吗？

我们策划编辑出版这套“两岸文化星系丛书”，就是希望能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般，填鸿沟而移屏障，让两岸对文化的不同阐释得以交流对话，稍补历史造成的遗憾。

丛书取名“两岸文化星系”，一方面是拟喻星空中群星辉映、交光互影，共成一大星图之意；一方面也是因本丛书欲集结两岸文化研究具代表性、较有成就的作者与著作，共成“群星会”，让如许熠熠星光，照映吾人心灵。

2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希望探讨：时间、历史意识与中国文化叙事方式；人文关怀理想与圣贤、英雄、游侠观念的联系；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与中华文化；爱情文化模式与中华文化；生命意识与中华文化等等。初辑五册，均由两岸中壮学者执笔，文采斐然，论析精警，无庸赘述。谨此敬识于台湾佛光大学云起楼。

龚鹏程
2003年7月

自序

本书原无序,按体例要求需有一序,于是自序;自序又无多话可谈,于是想到一省事亦或有用的方法:将书之大要作一简述,以方便读者。

贬谪与贬谪文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现象。

中国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而其鼎盛期则在唐、宋两代。在这两代中,又突出表现于元和、元祐两大时期。在这两大时期众多的贬谪士人中,柳宗元、刘禹锡和苏轼、黄庭坚堪为突出代表,白居易则可作为承唐启宋的过渡人物。从屈原到柳、刘,中经白氏而至苏、黄,标志着中国贬谪文学的三个重要阶段,也显示了贬谪士人的三大心理流程。如果将屈原赋作中表露的主要精神意向视作贬谪主题的一种基本模式,那么,上述三阶段的突出特点便是模式的确立、模式的继承发展和模式的突破,亦即从执著走向超越。本书对元和诗人及其贬谪文学的研究即建立在此一认识的基础之上。

导论部分为全书论纲,重点阐述了贬谪的概念、性质、渊源、成因、类型、文学表现、贬谪士人的心态变化等,认为中国古代的负向贬谪大致可分四种类型,即志大才高,因小人谗毁而被贬(如屈原、贾谊);革除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如柳宗元、刘禹锡);直言强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如阳城、韩愈);党争激烈,因政敌打击而被贬(如李

德裕、苏轼)。这四种类型的成因有两大共同点,一是皆为封建专制制度严酷压抑的产物,一是皆源于广大士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及其对品节的持守。对古代士人来说,贬谪既意味着一种人格的蹂躏和自由的扼杀,又标志着一种沉重的忧患和高层级的生命体验。由此导致贬谪士人发生心理、性格、观注对象和思维态势的诸多移位,形成极具范式意义的执著意识与超越意识,并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开始了抒愤文学的专力创作。而骚动于其中的执著意识和超越意识,则构成了贬谪文学最富光彩的乐章。

贬谪文学具有高度美感效应的原因:其一,沉重的人生苦难强烈刺激了诗人往昔平和的心境,使其以全副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接触到了人类命运与生存意义等文学艺术最本质的问题;其二,在对忧患的顽强抗争中,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强力得以勃发,伟大的悲剧精神得以产生,从而给文学增添了水石相激般的壮美风采。因而,贬谪与非贬谪文学,同一作者贬谪前后的文学都颇有差异,在贬谪与文学、个体生命力与艺术穿透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正比例的关系。

2 第一章着重论述元和文化精神与柳、刘、韩、元、白五大诗人的政治悲剧。由贞元末经贞元至元和的二十年是唐帝国由中衰走向“中兴”的一个历史时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是与此一时期之政治、哲学、文学甚至军事都有紧密关联的五大诗人,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五大诗人多次被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贬谪文人群体。因而,要考察五大诗人的政治悲剧,就必须将他们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从对元和文化精神和五大诗人之文化品质的研究着手。

一方面,详细考察了从贞元末直至元和末的历史状况,认为强藩割据、宦官专权、君愎臣奸、士风浮薄等社会弊端是元和文化精神形成的前提条件,王叔文政治集团的革新运动则是此一精神的先声。军事上用兵蜀夏、克复两河、扫平淮西,政治上君臣协力、善于纳谏和敢于进谏,导致了此一精神的初步形成。同时,以五大诗人为突出代表的元和士人在儒学、文学、哲学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建树,以及他们基

于文学、学术、政事兼备之知识结构和身国一体之心理态势的参政实践,更给予此一精神以强有力的丰富、填充,从而构成了元和文化精神的三大层面:一、不甘衰败发愤图强的复兴精神和源于忧患而欲克服忧患、建基于多难兴邦、哀兵必胜信念之上的进取精神。二、立足现实,志在用世而又充满理性色彩的文化重建和文化追求——一种表层阐扬传统的文化重建和深层开拓新局的文化追求。三、与激切昂扬的参政意识和批判精神紧相关联的许国不复谋身的心性情怀。

另一方面,具体论证了五大诗人之贬与时代文化精神和专制政治的关联,着重指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本即预示着可能的悲剧性,而在元和文化精神影响下相对开明、宽松的政局和五大诗人益发刚直激切的心性,更给这可能的悲剧性增添了现实发生的必然因素。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政治上的宽松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谓开明的背后,时时闪动着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专制巨影。虽然就元和时期而言,其限度的尺码较之政局混浊的贞元年间要大一些,但也绝非可以任意延伸,一旦参政者越过了那道无形的界碑,悲剧命运就必然降临;而且宽松的政治往往更易于使人在掉以轻心中越过界碑。从实际情况看,元和时期适值历史的转折关头,唐宪宗既有鉴于德宗晚年大权独揽、信用奸邪而导致的政局污浊,决意革弊图强,适当放权,信用宰相,注意纳谏,又深知德宗因藩镇、宦官势力的牵制,实际权威已大大下落,因而,扫平藩镇以强化中央皇权便构成了他的首要政治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几乎军事上、政治上的每一成功,都使他的实际权威增强一步,这样,表面的权力下放和实际的权威增加便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他的实际权威每增强一步,外放的权力便收回一些;君主专制的程度也就加深一层,直至元和十四年时代文化精神发生质变。于是,一面是参政主体为追求理想而不惜身命的执著态度,一面是潜隐于时代文化精神中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基因,当此二者碰合一起而参政主体又无视开明与专制的界限,一再跨越禁区的时候,贬谪厄运便势所难免了。

作为元和文化精神开创者和推动者的五大诗人,竟毫无例外地恰恰成了这一精神的变形牺牲品,对这一深刻的背反现象,该章从历

史的、现实的、文化的、个人的诸多角度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元和诗人与盛唐诗人的参政意识、知识结构、社会地位和心态异同作了比较论证,对韩、元、白和柳、刘之政治悲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亦一一予以辨析,从而得出结论:元和五大诗人的政治悲剧无不源于封建专制政治的严酷打击,无不源于他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及其对品格的持守;而在他们革弊图强、对整个官僚政治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自己也难免这破坏反作用于他们的必然性的悲剧结局。

第二章重点论述五大贬谪诗人的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所谓沉沦,盖指生命由高向低的跌落过程及其在此一过程中遭受的磨难。五大诗人的被贬即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而且在客观上呈现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在严诏催迫和吏役驱遣下踏上万死投荒的贬谪路途,个体生命发生巨大逆转。天宝五载(746),唐朝廷对贬官的处置发生了大幅度的严厉升级,自贬诏下达之日起,贬官无不仓促就道,且多为吏役驱遣,“日驰十驿以上赴任”。在严酷的政治打击和人格凌辱下,面对南方炎瘴之地那陌生而危险的世界,五大诗人不能不产生一种饱含屈辱的恐惧惶惑之感。由于他们赴江淮岭南多经蓝田武关道,此道不仅难行,而且凝聚着一种严酷惨烈的、饱含无数迁客血泪的文化内涵,所以对屡经此途的五大诗人来说,便不能不于恐惧惶惑之余更感受到一种刻骨的凄怆。白居易的“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均内含全部的生活重负、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锥心泣血的悲凉,而不应仅从文学鉴赏角度将其草草放过。

第二阶段,到达贬所后,由于自然、社会等异质文化环境的多方面侵袭刺激,贬谪诗人的肉体和精神受到更严重的摧残。唐法屡申明:贬臣“不宜与善地”、“尽发遣向僻远无兵马处”、“更移向远恶处”。五大诗人在元和十五年以前贬、迁之地,属远恶州郡者占十分之七,就中尤以潮州、柳州诸处为荒恶。瘴气、酷暑、毒虫交相为患,使得贬谪诗人的死亡意识急速萌生,而且日趋向生与死的临界点靠近。同时,贬所地域的偏僻、吏民的稀少、语言的难懂、风俗的卑陋和文化的

落后,则使得贬谪诗人信息闭塞、缺少交谈对象,几与整个社会隔绝,因而倍感寂寞孤独。文章系统考察了五大诗人贬谪前后的官职、地位变化和唐代重内官轻外官尤轻吏职的社会风习,考察了他们所受凌辱以及“罪谤交积”的社会舆论压力,考察了他们抵达贬所后的各种变故和心理落差,从而深入地论证了他们苦闷情怀的成因和表现程度。

第三阶段是前两阶段的自然延续,其时间因素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谪居时间的延长,贬谪诗人的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日趋强烈。从谪居时间看,韩愈两次被贬约五年,白居易六年,元稹十年有余,刘禹锡二十三年,柳宗元则终至葬身贬所。从唐代律令看,左降官不得“擅离州县”,“遭忧奔丧者”亦所不许,以致“一经贬官,便同长往;回望故里,永无还期”,以致受本能驱使的欲念与受现实约束的行动、相对自由的精神与极不自由的躯体始终处于冲突搏斗中,并最终将重重苦闷沉重地积压在人的心头。与古代士大夫一样,柳、刘等贬谪诗人也具有亲和自然的意向,但由于他们是作为被朝廷抛弃的“罪人”而来到山林中的,这就首先失去了一般文人那种对自然主动追求的心性情怀,而他们所置身之山林又多为荒恶鄙远者,“顾地窥天,不过寻丈”,这就又形成了一种客观的外在压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虽厌恶朝市的混浊,却又极希望借回归朝市以洗刷罪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对山林和朝市的双重情感以及欲归而不可归、不可归而愈思归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他们化解不开的苦闷情结以及《囚山赋》、《履霜操》等作品的大量产生,直至导致他们性格发生变异。柳宗元由刚直激切一变而为自甘寂寞、孤独冷僻,甚至内心之“戚戚”以表面之“浩浩”出之,哀乐莫辨,悲欢难言,正反映了长久被弃被囚和生命荒废留给他的精神创伤。

贬谪诗人脱离谪籍后心态变化颇有不同。该章最后分析了苦闷淡化(韩、元)、延续(刘)、沉潜(白)三种类型的成因和异同,揭示了贬谪于贬谪诗人身上烙下的“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的痛苦印痕,以及对他们后期人格的持续影响。

第三章以元和五大诗人的执著意识和超越意识为题,认为这两

种意识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表现出一种主体自我拯救的意向，都赋予人以源于苦难而超拔于苦难的自我提升、自我净化的力量，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执著型诗人对那幕导致自己被贬的政治悲剧始终耿耿于怀，对自己坚持并为之奋斗过的理想信念始终难以弃置，对道德人格和孤愤独标的志节始终坚定地持守；而超越型诗人虽未放弃理想、改变志节，但却始终具有一种对此理想、志节的消解因素，流露出一种“忧喜心忘便是禅”的超然意绪，借以追求一种艺术化的自由人格境界。柳宗元、刘禹锡和白居易，分别是这两种意识的突出代表。

在对韩愈、元稹的意识倾向和人格内蕴予以考论之后，首先论述了柳、刘执著意识的三大特征，即悲剧反思中的理想坚持、基于复仇心理的勇猛反击、执著自我的发愤著述；接着考订辨析了柳、刘是否“悔志”、“饰非解谤”和他们的性格变化及其与佛教、僧徒的关系，认为前者实乃不实之词，而他们对内方外圆性格的推崇，既深刻反映了严酷的专制政治对人性的异化，也明确展示了贬谪诗人在自我防御机能引导下于困境中求生存的日渐成熟，而在终极意义上，他们的执著态度却并未因此发生改变，甚至他们的性格在实际表现中也始终未曾与其主观设计相统一。关于他们对佛教的热衷，盖有三层意义：其一，借此出世间法减轻苦闷的程度，以获取暂时的心理平衡；其二，借与“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的僧徒交往，来抗衡浊世衰风，维护自我狷介高洁的人格；其三，将佛学作为一门深刻的学问来研读，有接受，有批判，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将佛学对偶像崇拜的否定精神融贯于他们“立大中，去大惑”的理性批判之中，揭去天、神、怪、异的神秘面纱。从本质上看，柳、刘乃是儒门中人，一狷一狂，奠定了他们的基本心性。

在中唐历史上，白居易是一个特异的存在。“情恕于外，理遣于中”，是其超越意识形成的前提条件；由“兼济”而“独善”，是其超越意识的核心内容；禅悦、安心、知足、看破，是其走向超越的心理机制；亲和自然，放怀山水，则是其走向超越的具体途径。他很少像柳、刘那样将佛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读，而是以一种随缘适意的态度径将佛、老、大旨拿来，当下了悟，直证本心，使之为自己的现实人生服务。白氏的

“独善”与孟子讲的“独善”是颇有差异的，孟子的说法重在有道义、人格的坚持——“穷不失义”、“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白氏的说法重在丰衣足食，自足自适——“何往而不自得”。不是改弦易辙，而是寻求自得；不是胶柱鼓瑟，而是泯灭町畦；不是系心于形而上的理想，而是倾力于形而下的安适；一句话，不是死死抱住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的道德人格不放，而是追求“冥心无我，无可而无不可”的自由人格，这才是白氏的真正用心处。

第四章重点考察贬谪文化、贬谪文学自屈原经贾谊而至中唐的演进轨迹。首先注目于原始弃逐现象及其类型，伯奇故事的基本结构，由此总结了弃子逐臣与君亲合一之宗法社会的深层关联。继而论述了屈原的执著意识及其在贾谊那里的变化，揭示了随着专制政治的日益强化，广大士人离心力愈强、自我保存本能愈为扩展这一历史演进大势，从而对元和贬谪诗人的意识特质予以界定，认为柳、刘在对屈原模式的总体继承中，也展示了发展和超越的意向，即他们已不再像屈原那样眷恋君主，而是以对专制君主之本质深一层的认识，表现出了一种自觉的疏离；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关注程度也不如屈原那样始终如一，而是不时地自寻解脱；至于他们的生命意志及其对自由生命的追求，也超越了屈原。

白居易一开始就对屈原模式表现出了明确的背离，他“长叹灵均不知命”，屡屡发表对屈原泽畔苦吟、独清独醒的非议。他一方面热衷于以贾谊自况，展示了一种对才人而非志士的趋同心理；一方面瓣香陶潜，将其作为自我超越的直接范型。换言之，陶并非一般人认为的直到宋人苏轼那里才找到了知音，而是早在中唐时期就与白居易相交莫逆了。然而，白与陶又有一间之隔，相比之下，白俗念颇重，亦多挂碍牵缠，在老庄知足思想和禅宗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他既避免了陶的贫寒困顿，又躲开了激烈的党派倾轧；既获得了心灵的安顿，又享受了生活的赐予，从而在屈原、柳、刘的执著和宋人苏、黄的超越之间，别具一种过渡性的文化意义。

第五章论述元和贬谪文学的悲剧精神和艺术特征。认为：是贬谪，导致了五大诗人的生命沉沦，也正是贬谪，激发了他们借文学创

作抒发郁愤并与忧患抗争的动力和勇气，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摆脱俗累、宁神壹志专力进行创作的条件。他们的作品或一部或大部甚至全部都作于谪居期内。随着创作主体立足点的变化和心理的再度位移，亦即其关注对象从社会政治向个体生命、追求目标从建功立业向雪冤复仇、思维触角从人伦道德向苦难人生的重大转变，这些作品大都以颇不同于贬谪前的方式转入了对人内心世界的开掘和描写。于是，内向的悲恨聚敛代替了外向的激情发越，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让位于对自我、生命、人生、命运的深刻表现。

首先，沉重的悲伤意绪构成了元和贬谪文学悲剧精神的基础，而对人生遭际和自我生命的感怀悲叹则是此悲伤意绪的突出表现。在艺术特征上，大量使用表示时空的数量词，将个体生命置于广阔遥远的空间和悠久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其沉沦色彩；大量使用伤禽、笼鹰意象，借以更深刻地表现个体生命之受创、被拘囚的程度，乃是与此感怀悲叹紧相关联的必然结晶。与此同时，浓郁的思乡怀归之情以及频繁出现的登高望远之举，既表现了他们对人生终极归宿地的热切盼望，也表现了他们所经历的生命基本需求亦即归属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痛苦折磨，从而真实地再现了贬谪诗人从追求到失落那循环往复不能自己的悲剧性心路历程，有力地强化了元和贬谪文学悲伤沉重的格调。元和贬谪文学与唐代中前期贬谪文学有着明显不同，大范围、长时间、群体性的鸣唱，悲剧意蕴的深化和艺术特征的鲜明突出，群体基本风格的形成，是此一时期贬谪文学悲伤意绪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基本特点。

其次，元和贬谪文学还展示了突出的逐臣孤愤情怀和激越悲壮格调，其主要特征有四，即由内心向外喷发不可遏止的直接抒情方式，对政敌、浊世予以鞭挞揭露的寓言讽刺方式，将强烈孤愤纳入饱经沧桑的悲凉心境，去审视社会、解悟人生的理性认知方式，借观照、反思历史以感慨现实、自浇块磊的咏史抒怀方式。这些方式及其表现的情感指向和声韵格调，虽或显或隐，或直或曲，或喷发或寄托，或低沉或高亢，但都指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饱含主体生命意志的不甘屈服、顽强抗争，都交汇为同一旋律，即有如焦桐孤竹般的深沉激越、苍

凉悲壮,从而构成了元和贬谪文学的精髓——悲剧精神。

再次,柳宗元的悲剧游记文学是元和贬谪文学的典型代表。柳氏“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的现实忧愤和寂寞心态,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直接象征性、间接表现性和风格偏执性三大特征,是解读柳氏贬谪文学特点的关键。一方面,柳氏对自然山水既爱又怜的心态导致了主体与客体在某一层面的深层契合,由此借山水之被弃直接象征诗人之被弃;借对山水美的发现和开掘,来表现人的自我价值;借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来否定社会现存秩序和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柳氏与自然山水在本源意义上又难以取得真正的和谐同一,自然山水局部的美和整体的恶,贬谪诗人暂时的乐与永久的忧,乃是横亘于其游记诗文中的极为突出的内在矛盾,由此导致间接表现性方法的大量使用。诗人有目的地选择与自我情志相一致的自然景物,既注重客体的真实再现,又使其饱含主体的情感色彩,从而曲折传达出浓郁的幽独冷寂气息。然而,由于诗人的精神时时与危急万变的世界相接——出游山水的时候,往往是他最苦闷的时候;与奇山异水相对的时候,往往是他稍感轻松的时候;返回郡中的时候,往往是他失落感最强烈的时候;因而,他的心境不能不“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而间接表现性的方法也不能不时常为直接表现性的方法所取代。更进一步,与诗人凄冷峭直的心性相应,其游记诗文无不具有浓郁的冷峭特色;从另一角度看,这种冷峭又是诗人极为偏爱和着力追求的结果。诸如艺术造境的幽静深邃,所用意象的清寒峻刻,遣词造语的着意锻炼,用笔行文的严整警拔,频繁出现的青、翠、黑、白色彩,大量使用的戟、刀、剑、铓、尖山物象,皆与诗人的自觉追求有关。这种偏执性的风格,既印证了诗人的心性特点,也有力地展示了他意志上的顽强性,整个地贯注着一股身处逆境虽悲伤却不肯降心辱志的清刚之气,闪现着一种深沉凝重而又猛志常在的生命情调和悲剧精神。

最后,以“诗豪”刘禹锡为代表,论述了元和贬谪文学悲壮劲健的风格特点。就整体而言,元和贬谪文学的主要过程是在生命力与阻力碰撞、抗衡的阶段展开的,其中大量存在的,是被压抑的沉重悲伤,反压抑的激切孤愤,压抑与反压抑长久相持的冷峻峭直,却较少一种在

压抑中备经磨难而能高瞻远瞩傲视忧患的悲壮劲健。这种悲壮劲健，便是生命力对阻力的克服，对自我本质的肯定，是生命力之深度和力度的象征，也是悲剧精神最高层级的表现。它集中呈露于刘禹锡的作品中。首先，它表现在诗人对待忧患的态度上；其次，表现在诗人对生命意志的自觉磨砺、对自我人格的顽强坚持上；最后，它更突出、更本质的表现，则是在诗人众多的悲秋、颂秋乃至壮秋的作品中。在他笔下，人与秋乃是一种双向交感并以激发生命意志为核心的多维关系，而秋季之苍鹰、骏马意象的大量使用，更给其作品增添了一种深厚的、本能的生命强力，并由此展示了诗人在与大自然的紧密融合中追求个体自由生命的强烈欲望。这是一种百折不挠、奋迅无比的精神，是一种振衰起弊摧枯拉朽的劲力，它的终极根源，既在于苦难对诗人的压抑以及在此压抑下生命顽强抗争的向上挣扎，也在于中国民族行健不息之文化精神的深厚涵育。因而，必然导致贬谪诗人以把握生命的肯定形式去表现生命曾经遭受过的否定内涵，以惜时重时的积极进取去取代悲时叹时的消极意绪，以自我生命与自然生命的深层契合去激荡行健不息的志士意志，从而为悲怆沉重的元和贬谪文学增添了一曲“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时节，安能激壮心”的雄豪高唱。

结论：元和贬谪文学诸多艺术特征和风格主调的形成，无不源于贬谪诗人命运的悲剧和克服悲剧的精神。